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张隆溪 著

从比较文学到 世界文学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World Literature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隆溪 著

从比较文学到 世界文学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World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张隆溪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0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9188-5

I. 从… II. 张… III. 比较文学-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I 206-53②I 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886 号

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

张隆溪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196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88-5/I·713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564655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自序：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与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也恰好是在三十年前，我编辑的《比较文学译文集》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于198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那之前，季羨林先生发起并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小组，除季先生之外，有李赋宁、杨周翰、乐黛云和我一共五人，并聘请钱锺书先生担任我们的顾问。那时正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年代，比较文学的复兴正是那时在文学研究或人文研究方面，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北大这个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办了一份油印的《通讯》，包括一些讯息，也有短小的文章，寄给全国其他一些大学对此有兴趣的学者们。这在当时，对比较文学的兴起，可以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学界有密切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好几位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包括当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欧阳桢教授和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叶维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荷兰乌特列希特(Utrecht)大学佛克马(Douwwe Fokkema)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教授等，都到北大或其他大学演讲，对促进国内比较文学的兴起有很大帮助。我1981年在北大西语系获得硕士学位(那时国内尚未设立博士学位)，也就以比较文学作为自己后来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中美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于1982年在北京召开，钱锺书先生要我参加。我为那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英文论文，中文本题为《诗无达诂》，发表在1983年冬季一期的《文艺研究》上。我1983年去美国，198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比较文学教授近十年，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任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至今。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中西比较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主要范围，发表的学术论著也以此为主题。这次谢天振教授一定要我把历年来的论文集为一本，收集在他与陈思和、宋炳辉三位学者共同主编的“当代中国比较

文学研究文库”里,也就让我有机会重新整理这三十年来发表的论著,由此而回顾自己在中西比较研究当中走过的路径。

在国内比较文学开始发展的初期,除译介国外学者的论著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当时社科院组织编写一部介绍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参考书,钱锺书先生推荐我撰写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就是北大图书馆也缺少国外新书。恰好我有机会在1982年春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访问一个月,在那里读到不少英美出版的新书,也购买了许多西方文论的重要著作带回北京。对于后来我撰写有关西方当代文论的文章,这是最好的准备。后来由钱先生介绍,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见面,约我为刚创办不久的《读书》杂志撰稿,于是从1983年4月起至1984年3月止,我在《读书》开了一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的专栏,每月一篇文章,介绍了从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到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以及德国阐释学、接受美学、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等西方文论的主要派别。这些文章虽然以介绍西方文论为主,但每篇都在结尾专辟一节,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也往往举出中国古典文论中相关或类似的看法与西方文论作比较。后来这些文章集为一本小书,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作为“读书文丛”之一种,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出版。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阶段,我继续写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但转以英文为主。1984年春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做一个重要讲座,即“Eberhard L. Faber Class of 1915 Memorial Lecture”,当时我正在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即以“道与逻各斯: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为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讲稿后来经过整理,在1985年3月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发表。这也是为我第一部英文书最先奠定的基础。在哈佛读书期间,好几篇上课写的期末论文经过修改,都发表在美国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如为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讲授的圣经与文学批评专题课所写论文,比较《圣经·雅歌》与《诗经·国风》的评注传统和讽寓解释,就发表在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一期。这篇文章为我很多年之后写《讽寓解释》(*Allegoresis*)一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我为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讲授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

写的期末论文,专论王尔德的批评理论,就发表在《德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号上。数年之后,斯坦福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专家伽格尼尔(Regenia Gagnier)教授编辑一部《王尔德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 K. Hall, 1991),收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最具代表性的王尔德批评”(“state-of-the-art Wilde criticism”,见该书编者序第1页),把我那篇文章也收在文集里。又过了十年,另一位学者梅丽莎·诺克斯(Melissa Knox)出版了一部专著《王尔德在1990年代: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Oscar Wilde in the 1990s: The Critic as Creator*,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1),那本书就以讨论我那篇文章开始。诺克斯指出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88年,而在那之前一年刚好出版了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里程碑式的王尔德传记,她认为“这两者都是最早认真看待王尔德的文学批评并发现其价值的论著”。近年来好几位研究王尔德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还引用或者提到过我的那篇论文。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的阐释学》于199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此书1997年有韩国延世大学郑晋培教授主持翻译的韩文本,1998年出版了四川大学冯川教授的中译本,此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又重新排印。1998年我的第二部英文著作 *Mighty Opposites*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集了涉及中西比较的六篇论文。我在同一年由美国到香港工作,我的老朋友陈万雄博士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在他敦促之下,2000年我在香港出版了《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后来增加了两章,2004年由北京三联书店用简体字出了第二版。2005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部英文著作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此书讨论东西方经典的讽寓解释,这种解释总是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认为还有另一层隐含的意义,往往是宗教或精神的意义,或者道德或政治的意义。我在此书中讨论了讽寓解释的起源、历史和作用,也指出超出字面甚至不顾原本本来意义而强作解人的危险,如断章取义而转化为文字狱之类的政治解释,同时也探讨了作为讽寓的乌托邦文学。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那是继《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之后我的第三部中文书。同年

春天,我应邀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了亚历山大讲座,四次讲稿用中文写出来,题为《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2006年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在一年之后,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1998年到香港工作后,我用中文写作比以前稍多,也结集出版了几本书。除在台北网路与书出版社有《五色韵母》和《灵魂的史诗:失乐园》之外,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又于2011年出版了《一榖集》,后者是“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收集了历年来发表的三十篇论文。2011年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以阐释学与人文研究为题,做了四次演讲,后来增加一章,汇成一本书稿,此书可望明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兴起。比较文学在美国和西方经过战后50—60年代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文学理论热,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有运用这种语言学理论在人类学中取得出色成果的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和民俗的研究,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符号学和叙事学有特别重要的发展,但也有一种抽象的趋势,即为了注重叙述的深层结构而逐渐脱离文本的具体细节。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文学理论逐渐转为文化批评理论,文学研究也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而以性别、种族和阶级为核心的女权主义、少数族裔理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同性恋研究等,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脱离开文学和文本而趋于抽象的理论。对传统和经典的批判,尤其是所谓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的倾向,割裂了传统,造成文化的断裂,甚至社会的碎片化。2006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十年报告,就明确指出批评理论脱离文学而造成了比较文学的困境和危机,并且提出如何重新认识“文学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的兴起就是由过度抽象化的文学理论重新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简单否定文学理论在前一阶段的发展,恰恰相反,世界文学正是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对当前世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才真正可能复兴。

虽然歌德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但他在1827年年初与爱克曼谈话时,从读一部中国小说的经验说到诗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

学,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说,歌德是以超出欧洲之外的广阔视野来看待世界文学的。由于歌德在欧洲文学和文化界的地位和声望,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谈话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影响。然而在西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过去并非真正“世界”的文学,而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学界对 19 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深刻反省和批判,于是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诉求和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歌德提倡的世界文学才真正能得到学界的重视而重新兴起。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当前在美国和欧洲都方兴未艾的世界文学研究,抱有很大的兴趣和参与的热情。目前有来自世界各地一个十多人的小组,组织编写一部四卷本的《文学的世界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这部书数年之内将由著名的 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我参与其中,并负责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对世界文学的兴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教授也许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他和另外两位学界朋友卡迪尔(Djelal Kadir)和达恩(Theo D'haen)教授合编了《劳特里奇世界文学伴侣》(*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今年年初刚刚出版,其中有两章由我撰稿。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说来,比较研究的吸引力就在于能超出单一文学传统的局限,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中丰富多彩的文学,了解人类精神文明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世界文学的兴起就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环境中,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重新去阅读和认识世界各国文学中有价值的作品。

回顾我这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可以说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都在中西比较研究的范围内耕耘。再从所发表文章专著的内容来看,则可以说是在比较广泛的背景上讨论文学和文化的問題,而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文学研究当然不能脱离开作品文字本身,但我从来认为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理解文本,而需要在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更宽阔的背景上来深入探讨,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涉猎越多,越感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也越感到谦卑之重要,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自知之明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不是没有主见,所以在有人故意贬低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流言蜚语所说得那么不堪,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把你夸奖过度,恭维得不合实际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像那些过奖和赞誉所说得那么

了不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是在学问上对自己永远不满足,知道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这才有长进的可能。就像莎士比亚喜剧里所说:“傻瓜总自以为聪明,聪明人却知道自己是个傻瓜。”(“The fool doth think he is wise, but the wise man knows himself a fool.” *As You Like It*, v. i. 31)

在选择自己的文章编为一集时,我一向主张出书不要有重复的内容,所以我在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几本书,都没有重复的篇章。这次谢天振教授要我收集能代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文字,加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我就颇感为难,因为我已经有好几本中文书出版,要再有一本新著,短时间内实在办不到。但天振兄强调说,这套书检讨中国比较文学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注重有代表性,而不在于是否新著。经他一再催促,我也只好勉为其难,选择自己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写成的一些文字,集为一本,其中与已经出版的书难免有重复之处。这一点我必须先向读者诸君交代并致歉,这本书里毕竟也有几篇是曾在刊物上刊载,但是第一次在此结集发表。如果此书能引起读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兴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2012年5月10日于香港

目 录

自序：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

上编 文艺篇

东西方研究：历史、方法及未来	3
从外部来思考：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05 年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 发展趋势	14
文学理论的兴衰	23
中国古代的类比思想	30
诗无达诂	35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43
现实的提升：伽达默尔论艺术在我们时代的意义	49
现代艺术与美的观念：黑格尔美学的一个启示	62
翻译与文化理解	70

下编 文史篇

记忆、历史、文学	83
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	90
约翰·韦布的中国想象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	102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110
历史与虚构：文学理论的启示和局限	129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143
掷地有声：评葛兆光新著《宅兹中国》	156
法西斯时代的日本	176
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	189

上 编

文艺篇

- 东西方研究：历史、方法及未来
- 从外部来思考：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05 年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趋势
- 文学理论的兴衰
- 中国古代的类比思想
- 诗无达诂
-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现实的提升：伽达默尔论艺术在我们时代的意义
- 现代艺术与美的观念：黑格尔美学的一个启示
- 翻译与文化理解

东西方研究：历史、方法及未来

在 21 世纪之初,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都在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可以说这是我们开展东西方研究极为有利的时刻,为研究东西方思想传统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这个时刻,我们重新审视东西文化交往的历史,以窥见未来发展可能的途径,也许是深化东西方研究必须迈出的一步。东西交往的历史,在古代有丝绸之路,在中古有马可·波罗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国的游历,在明末清初有利玛窦和基督教传教士推动的东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之后,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陈寅恪先生曾用“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这样沉痛悲愤的语句,描述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外族之侵迫”所面临民族存亡的险境^①。无论中英鸦片战争或中日甲午海战乃至满清帝国的覆灭,再到八年抗日战争和随后国共内战造成台海两岸的分隔,中国近 150 年来的历史真可谓多灾多难,不堪回首。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经过了数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的劫难,中国终于在三十多年前推行改革开放务实的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欧洲和北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金融和信贷危机,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也发生巨大变化,于是形成当前全球秩序的急剧转变和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制度而言,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和整个亚洲以及巴西和南美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过去认为毋庸置疑的关于全球各地力量均衡的许多观念。简单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过去整个世界都以美国和西欧为中心,这个观念现在正在逐渐改变,在此形势下,西方对东方,尤其对中国,开始产生了更多了解的意愿和兴趣,这就形成上面所说对于开展东西方研究有利的时机和良好的条件。

^①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1 页。

从历史上看,东西方的交往远在古代就已开始。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往往有令人惊异的发现,说明中国与西域物资和精神文明的交往,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更多、也更早,而且西域不仅止于印度和中亚,甚至远及于希腊、罗马。中国古代金石雕刻艺术,就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例证。四川三星堆出土了时间相当于殷商时代的大型青铜雕像,西安秦始皇陵出土了大型铜车马、汉墓前神道有大型石刻,据林梅村的研究,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大型石雕,是在多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艺术。“首先,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的影响;第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金石雕像艺术又得以和中亚希腊化艺术乃至波斯艺术进行交流。”^①中国境内出土过许多罗马玻璃器和钱币,这就证明“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必有颇为发达的贸易往来,中国史籍与西方史料所说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古代交通当为信史”^②。然而交往不仅止于物质文化,民间故事的流传,在古代也有令人惊讶的广远程度。杨宪益发现在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里,不仅有欧洲童话里著名的灰姑娘(Cinderella)故事,而且有德国尼别龙故事。杨宪益认为前者“至迟在9世纪或甚至在8世纪已传入中国”,而且有趣的是,中文“灰”字在德文里是Aschen,“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鲁萨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在那个中文故事里,“这位姑娘依然名为叶限,显然是Aschen或Asan的译音”^③。如果说灰姑娘故事是由海外传入中土,《酉阳杂俎》里古龟慈国王阿主儿降龙的故事,杨宪益就认为“是西方尼别龙(Nibelung)故事的来源”。这两个故事不仅情节很相似,而且“据西方学者考证,西方的尼别龙传说本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故事,加以附会。这个王的名字在古日耳曼传说里作Etzil,同这里王名阿主儿正合”^④。以上这些例子说明,无论在考古还是在文本的考释方面,古代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仍是一片有待开垦的领域。

13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5?)到元大都(即今北京),是中古时代中西交往的一件大事。虽然所谓《马可·波罗行纪》并非马可本人撰述,此书问世之后也不断有人怀疑其记叙是否真实,但据研究马可·

①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③ 杨宪益:《译馀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④ 同上书,第68页。